

中日关系史研究成果

东亚视域与 遣隋唐使

王勇 /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视域与遣隋唐使/王勇主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112-0743-2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中日关系—文化交流—唐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242. 03-53②K313.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3938 号

东亚视域与遣隋唐使

作 者: 王 勇 主 编

责任编辑: 刘 彬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责任校对: 贾文梅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1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总字数: 288 千字

总印张: 16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0743-2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序章 隋文帝与遣隋使	1
------------------	---

甲编 纪念讲演	1
---------------	---

现代遣唐使与东亚交流	/ 3
遣外使节与文明载体	/ 8
新罗遣唐使的历史作用	/ 13
从遣唐船到唐商船	/ 20

乙编 文学艺术	25
---------------	----

诗的两面与歌的一面	/ 27
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的述怀诗	/ 38
菅原道真和停派遣唐使对日本的影响	/ 49
古代日本汉诗的发轫	/ 54

丙编 制度文化	63
---------------	----

遣唐留学生与日本文化的形成	/ 65
隋唐都城接待外使机构及设施	/ 74
唐代宫人的相关考察	/ 92

丁编 书籍文物	109
---------------	-----

奈良寺院摄取汉文典籍小考	/ 111
--------------------	-------

诗的两面与歌的一面

——与遣唐使有关的诗歌世界

〔德〕魏樸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

一、诗歌世界与外交世界

在文化交流的情况下诗歌是一种高水平的意象交流。人们学习外语之时，是从简单的对话而出发的。可以达到最完整的、被精炼的吟咏诗歌的水平的人可能是很少见。与此相对，在世界上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文化交流实属例外。

前近代以前的东亚交流，语言条件确实与之相反。各国最基本的口语难以沟通，一般人们跨越好几个阶段的长期语言教育，通过具体的即吟咏汉诗来进行高水平的意象交流。这是东亚汉字文化圈所具有的、令人玩味不已的矛盾之一。

最近，王勇先生言及东亚汉诗是带有外交性官方功能的“诗的对话”^①。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越南的文官们，擅长用诗来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由此表达出一种东亚文化共性。虽然他们仅能用母语揣摩意思，却能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志”和“心”。

处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汉诗文化存在不少矛盾。其一，是在东亚上述现实人际关系中的语言差距和象征性地亲密诗意间的矛盾；再者，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间不时存在的外交政治冲突和欢送会、宴会等体现友情的咏唱之间的矛盾。

以新罗和日本为例，王勇先生将以上矛盾做如下表述：“尽管新罗和日本在历史上作为对手政治关系异常紧张，但主客吟唱汉诗正与相互执行公事时的险恶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洋溢着非常融洽的氛围。”^② 也就是说，宴会和欢

① 王勇《概説・漢詩のネットワーク》，收入王勇、久保木秀夫编《奈良・平安期の日中文化交流—ブックロードから》，〔日〕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1年，149～50页。

② 王勇《概説・漢詩のネットワーク》，收入王勇、久保木秀夫编《奈良・平安期の日中文化交流—ブックロードから》，〔日〕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1年，148页。

送会席上交流的诗歌不是反映一般政治现实，而是创造出一个被语言的比喻用法所支配的世界。

遣唐使往返于海路，途中时有漂泊、遇难、死亡发生，在唐朝滞留期间时常受到文化冲击，还有接触异文化后产生的不安，但那种危险和不安，却不太在汉诗中直接表达出来。当然，在遣唐使的宴会酬唱及送别诗中，也会流露出跨洋过海需要极大的勇气、航海过程中会面对无数危险性的情绪。但诗中频繁使用的“蓬莱”、“扶桑”等传说，把往返日本之事浪漫化了。

最后，本论文所论述的汉诗文化的矛盾，即是由遣唐使的派遣和与之相关的汉诗所构筑的世界，与和歌所吟咏的世界之间存在的应当引起关注的视差。《万叶集》收录的二十多首有关遣唐使的诗歌，这些确实是以派遣前日本国土的送别仪式、海路渡来的安全和平安回国的祈祷为中心，简单来说，遣唐使的汉诗是日本人作为超越过境的东亚人的“诗的对话”的产物，反而给遣唐使写的和歌可以说是保护顺利回国途中的神和日本人自身间的“诗的对话”的产物。

那么遣唐使时代的东亚汉诗传统怎样能够进行“诗的对话”，“诗的对话”到底是什么，与遣唐使的派遣相关诗歌又是如何创造出诗世界，汉诗与和歌都吟咏些什么呢？本论文中将对上述几个问题一一进行探索。

首先想简单地描述下与遣唐使相关联的汉诗与和歌世界的不同点，其次想论述送别遣唐使的诗歌对遣使的目的和意义是如何描述的，最后拟探讨诗人和歌人是怎样利用诗歌来描写古代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的。虽然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但笔者试图挑战一下。

二、与遣唐使关联的诗歌世界

与遣唐使关联的和歌世界与汉诗世界完全不同，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遣唐使的轨迹来看，出发前举行各种仪式祈祷使者往来的顺利，《万叶集》收录的和歌大半是举行仪式时所作的。出发前的仪式包含了春日山的神祇祭祀、天皇在紫宸殿举办的饯行宴会、神祇宫派遣的使者主持的住吉神社仪式。^①吟作和歌的地点无疑仅限于日本国土，但《万叶集》收录的唯一例外的短歌，是《山上臣忆良在大唐时忆本乡作歌》（卷一、六十三）。这是唯一在

国外吟作的比较特殊的和歌，以下作详细论述。

因遣唐船从日本出发前所作汉诗不太留存，故吟作汉诗一般被认为日本人到达大陆后的那段时期。但遣唐船离开日本前用以抒怀的文体显然不是汉诗，说是和歌也不为过。要说和歌世界和汉诗世界为何有如此差别，我觉得和遣唐使关联的汉诗、和歌有不同的规则。《万叶集》中二十多首和歌有一大半不是由遣唐使本人创作的，而是由为他们送行之人所作的。733年山上忆良献长歌于即将入唐的多治比广成大使，同年笠金村咏作《赠入唐使歌》，匿名的母亲为使团成员之一的儿子献上和歌，藤原清河大使于752年被派遣之际，圣武天皇赠与和歌，这些全是为登上遣唐船的人所作的和歌。汉诗与和歌的作者及听众的区别，来自于双方文体的迥异。简单来说，汉诗是同中国人交流的基础，而和歌是对那些入唐使者不顾艰难险阻所感慨，祈祷他们一路顺风、安全往返的仪式之手段。

和遣唐使相关汉诗的世界受制于汉诗文对句的修辞，表现了与其相对应的两个极端。如“我”——“君”、“唐”——“日”、“西”——“东”、“陆”——“海”等对应形式是与遣唐使相关汉诗的基本支柱。典型例子要举天宝十二年（753）举办的宴会席上，诗人赵骅^①为他所作的送别诗《送晁补阙归日本国》。不过，那次阿倍仲麻吕因渡中遇险，重新回到唐朝。

西掖^②承休浣，东隅返故林。

来称郗子学，归是越人吟。

马上秋郊远，舟中曙海阴。

知君怀魏阙，万里独摇心。^③

这首离别诗每句都是对句，首联以代指中国的“西掖”和代指日本的“东隅”对应。“休浣”是官吏每隔十天洗衣沐浴的“休息日”之意，传达了赵骅对仲麻吕离别的感伤。19岁的仲麻吕于717年渡海入唐，在唐朝居住以及任官36年之久，753年回国途中遭遇海难，受他所敬仰的玄宗皇帝挽留又仕唐多年，后埋骨长安。赵骅的送别诗将仲麻吕仕唐之地“西掖”的印象与之艰难的“东隅”返“故林”的出发相对照，是把作为唐朝官员自然参加

① 在开元中取得进士。《全唐诗》中只收录一首诗。

② 西掖：中书省的别称，日本中务省的唐名。

③ 张步云《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5~16页；杨知秋编著《历代中日友谊诗选》，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16~17页；《全唐诗》129卷。

① 古瀬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国》（历史文化ライブラリー154），[日]吉川弘文馆，2003年，15~21页。

“休浣”而汉化的友人仲麻吕的一面与回到日本人所住列岛的外国人仲麻吕的一面相对比,为此表达离别的悲伤与心非所愿。

颌联是仲麻吕于717年到达之时,希望学习春秋时代邻国(现山东省)的学问,像广博的国君一样学习“郑子学”,也就是中国的学问,并希望仲麻吕753年回国时吟诵“越人吟”。^①据《史记》记载,有位名叫庄舄的越人在楚国做官发迹,生病时用越曲解自己的乡愁,“越人吟”是基于此越人的故事来表现在国外为官之人的乡愁。

颌联吟咏的是仲麻吕在唐时间,颈联则添加了他回国的空间。仲麻吕计划先“马上”离开长安去扬州,然后在“舟中”经历渡海过程。与颌联和颈联吟咏仲麻吕时间、空间的“道”相对应,尾联的对句回到首联“唐”与“日”的对应,讲述了仲麻吕对所住国即第二祖国未来的“乡愁”感。唐朝“魏阙”刚毅不动摇的安定性突显了仲麻吕回国时绵亘“万里”“独”受的“摇心”的不安。赵骅的送别诗作为与遣唐使有关的汉诗的典型例子。细看汉诗的结构,句子很巧妙地采用北部的“邻国”与南部的“越国”相对的并列故事。以此为据,“魏阙”和“摇心”的对比,可以说正是象征了遣唐使穿越重重危险渡海,前往大唐朝贡的难忘经历。

可以说与像新罗等朝鲜半岛的国家相比,“大唐”与“大和”之汉诗对句的修辞手法容易并列。这正如激怒隋炀帝的遣隋使小野妹子一行给隋炀帝递交的、称斥为“蕃夷之书”的国书所云“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②,在汉诗的对句中也自然使用对称的象征“西”和“东”的“中国”和“日本”。

汉诗中对句的修辞,使“中国”和“日本”频繁地成为对立概念,与此同时,对句也映照出两者的相似点和共有性。体现共有性的修辞一般根植于对自然的比喻与佛教的普遍性中。例如晚唐著名诗人兼词人韦庄,对回国的日本僧人敬龙赠送如下送别七绝: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③

中国和日本共有的“月”和“风”,用“一船明月”和“一帆风”的比喻来表示,以护卫舰的形式郑重地向日本僧侣献上送别诗。“月”在遣唐使的汉诗中,作为共同世界的印象频繁出现。任左大臣的天武天皇之孙长屋王在下面的偈颂中把“风”和“月”的普遍性和与中国僧侣们的“缘”结合在一起,表达了日本贵族和中国僧侣之间深厚的友谊。长屋王缝制了袈裟,让遣唐使带给中国僧侣们,并在袈裟的“缘”(接缝)处绣上偈颂。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寄诸佛子,共结来缘。^①

通过袈裟的衣“缘”和佛法,增加了相互的“缘”的意思,这样的物质性东西突出了“唐”和“日”的“山川异域”的区别,同时巧妙地加入了共有的“风月同天”和“缘”,可以说诗把特别的独一无二的“唐”和“日”的相对概念表达了出来。

长期留唐,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遣唐使具有强烈的语言意识,我们可从长屋王的偈颂中享受到语言的乐趣。如空海作了“离合诗”,玩转于汉字的“离字”和“合字”。而且诗人经常复原固定的地名、比喻的字面意思,创造出具有两面性的意思。汉诗能看出这样的语言游戏的,要数武则天时代渡海,与中国的妻子生了混血儿的释辨正作的著名的绝句《在唐忆本乡》,兹录如下:

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②

在《怀风藻》的诗人小传中,辨正被评为“性滑稽”、“善于谈论”。读了这首绝句后,大家也不难想象了。从绝句的题目来看,可知是表达乡愁的汉诗。那么汉诗是如何表现这种乡愁的呢?“远游劳远国”和“长恨苦长安”等

① 《史记》列传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富贵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2301页)

② 东野治之《遣唐使船—東アジアの中で—》,〔日〕朝日新闻社,1999年,19页。

③ 《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107页;《历代中日友谊诗选》,75~76页;《全唐诗》695卷。

① 《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119页;《历代中日友谊诗选》,215~16页;《全唐诗》732卷。诗序:“明皇时,长屋营造千袈裟,绣偈于衣缘,来施中华,真公因泛海至彼国传法焉。”

② 小岛宪之校注《懷風藻·文華秀麗集·本朝文粹》(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9),〔日〕岩波书店,1964年,第27首。

是最基本、最明显地表达了乡愁之意，但最有效的表现方式还是数叠字的修辞法。^①“日边”和“日本”、“云里”和“云端”、“远游”和“远国”、“长恨”和“长安”，语音上的相似性和意思上的对立冲突点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从“云里”到“云端”，即看到“云的影画”，定是诗人沉浸于“云里”，在白日梦中到达故乡“云端”。“远游”、“远国”也是一样，将语音的复制和意思的冲突相并列。“远游”一方面唤起“游览”和“游宴”的氛围，一方面也披露了诗人身在“远国”受乡愁之扰。最有力的并列是结尾处“长恨”与“长安”的正面冲突。长安京对患思乡病的辨正而言，成了“长恨之京”，他把地名“长安”的本意展示给读者，让人不由想起孔子讲过的“正名”的措辞，这么说应该还算妥当吧。

这首汉诗是辨正在唐期间吟作的，他当着中国人的面新解大唐之都的名字，实际上可以说是主张长安之地是长恨之地的意思。在大唐的京都“正名”是必要的，但在日本，“日边”的“喻名”的措辞是崇尚日本的意思。不用说“日本”的国名也是“太阳的本源”的比喻性的异名，将“日边”同“日本”对立，清楚地显示出异名的比喻性和两面性。

“日边”的表现手法很可能来自《艺文类聚》中《世说新语》的故事。^②据《世说新语》记载，晋明帝在洛阳4世纪初征服十六国赵汉时期，问年轻的元帝“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当时回答“太阳”，时隔几日又回答“长安”。父亲问儿子理由时，元帝先回答“太阳比较远”，他认为看到从长安来的使节而没见过来自太阳的使节；回答“长安远”是因为举目能看到太阳却看不到从长安。也就是说，辨正的绝句引用了这个故事，日本处在太阳的位置，而中国的都城（特别在317年的东晋天命变化时期）不在太阳的位置，可以说通过对比来显示出日本的特色。

辨正的绝句表达了对日本的乡愁，心系中国确实是站在大唐国土的立场上，对这首绝句框架里的长安的“长恨”之情以及引用关于远方“太阳”之

国的《世说新语》的典故，都发生在中国这片国土空间。

像这样中国的空间对诗歌起到多大的支配作用，我想把著名的遣唐使作的乡愁的和歌与绝句做一比较就清楚了。这首和歌是阿倍仲麻吕在唐期间所作，《古今和歌集》和《土佐日记》均有收录。

唐土にて月を見て、よみける
あまの原ふり さけみれば 春日なる 三笠の山に いでし月かも^①
[参考译文]《在唐见月而咏》：“仰首望长天，神驰（奈良的）春日大社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编者

这是首非常著名的和歌，它是仲麻吕在明州举办的欢送会上作的。这首和歌是为了使中国方主办人完全不能理解呢，还是想象的产物呢，虽然议论四起，但我想辨正和仲麻吕全然不同地表达出乡愁是无可厚非的。两位诗人身在大唐想念本国，辨正表达出“日边”的日本和“长恨”的长安间的两面性思想，仲麻吕则回忆起在日本的春日三笠山举行送别仪式时印象深刻的月亮。对于明州送别会上的中国主人来说，他将日本独特的风景一句话就给浮现了。仲麻吕在同样场合所作的一首汉诗，其一面性不是仲麻吕个人的感情，而是表现与和歌的文体相关联的一面。此诗题目为《衔命还国作》，作者署“朝衡”^②。

衔命将辞国，非才添侍臣。
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
伏奏违金阙，骅骝去玉津。
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③

汉诗空间特殊的两面性是通过对句的结构传达的。大唐“天中”的“明主”与在日本的“海外”之“慈亲”，向“西”等待给皇帝谢恩的日子与回

① 正如王勇先生所讲：“身为归国无望的天涯孤客，唯有使用此种独特的叠字修辞句法，才能吐露无限乡愁。”王勇《唐から見た遣唐使一混血児たちの大唐帝国一》，[日]讲谈社，1998年，129页。

② 余嘉锡笺疏，周祖谟、余淑宜等整理《世说新语笺疏》中卷下“夙惠”条（[台]华正书局，1984年，590页）：“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而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① 小岛宪之、新井龙藏校注《古今和歌集》406（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5），[日]岩波书店，1989年。

② 朝衡：阿倍仲麻吕的中国名。

③ 《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121~23页；《历代中日友谊诗选》，228~30页；《全唐诗》732卷。

到“东”边的故乡令人难忘的回忆相并立。仲麻吕身为唐朝忠臣谦逊地称自己为“非才”，通过紧凑的故事表达了离别之际对中国友人的深情厚谊。

春秋时代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徐君，得知徐君很喜欢季札的宝剑，打算下次见面时献给徐君，但第二次有机会经过鲁国时徐君已经亡故，季札把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离开了。诗中所引用的就是这个故事。与季札不同的是仲麻吕没有等待再次出访机会，在友人去世前将“平生一宝剑”送出后出发回日本。但出发前仲麻吕引用季札的故事来传达对友人的深情厚谊。诗人的送别和歌显然是以日本友人而吟作的，而诗人的送别汉诗无疑是对中国听众而言的。正如辨正的汉诗，日本的表述是站在中国的立场阐述的。仲麻吕利用中国神话里的“蓬莱”和“若木”不死的国家地名，为了和唐朝宫廷的“金阙”成为对句采用了日本和歌山的“玉津”（靠近住吉明神，被称为玉津岛、和歌之神）的地名。而且最后担任起周朝外缘吴国季札的使命，也意味着日本仅是周王朝的外缘之国。这和辨正的汉诗一样巧妙地利用地名的两面性含义，努力给听众传达不同的印象。

以仲麻吕的和歌和汉诗为例，我们能清楚地推测出和歌中日本本国词汇、立场、表现始终是一面性的（日本有限），而汉诗表现了语言和文学所具有的两面性（包括中国和日本的歧义性）含义。

三、诗歌中遣唐使派遣的目的

遣唐使的派遣不得不说是两面性的事业。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目的虽然有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目的是以朝贡来取得外交上的缓和，并获取各种书籍、贵重宝物、宗教文化等。那么，诗歌中是怎样言及遣唐使派遣的实际背景和目的的呢？我想现在探讨一下。

值得注意的是，与遣唐使相关连的汉诗中，几乎不涉及外交背景。但中国人知道日本人想带回中国的文化产物，特别是文献、佛经、舍利等，这点也是在和僧侣、留学生们赠答的诗中频繁提到的。

在唐代诗人皮日休（约834~883）给日本僧侣圆戴作的送别诗中，他以富于魅力的对句陈述了这一点：“贝多纸上经文动，如意瓶中佛爪飞。”^①贝多罗纸上记载的经典和放入瓶中的舍利，都是无生物却好像有生气，能动能飞；这既是圆戴安全渡海回国的护身符，又象征了书物、舍利等对中日文化交流产

生的影响力。中国诗人赞美日本僧侣、学生的学识，同时对危险的旅行和辛苦求学的回报到底是什么产生质疑。中唐一位叫行满的天台山僧人给友人最澄献上送别诗时，有述“何当到本国，继踵大师风”^①。同样的机会，中国诗人崔谔献送别诗给最澄“何当至本处，定作玄门宗”^②。也就明白了中国友人想像最澄回国后能保障他的高身份。云靖献给空海的送别诗中，预言了空海回日本后“到官方奏对，图像列王庭”^③，即天皇会造空海的像，因为空海学问上有突出成就。又郑壬的送别诗说，“他年绩僧史，更载一贤人”^④，即说明空海将来是会被写进僧史里的著名人物。

很多中国人和遣唐使的僧侣赠答的送别诗，叙述了僧侣冒着危险渡海而来的理由，是抄写经典、学习佛法知识，回国后作为成果获得官位和名声。但《竹枝词》这样的歌谣中颇受欢迎的中唐诗人刘禹锡，反用平常列举的渡海理由，向日本僧人献上如下轻松的送别诗。《赠日本僧智藏》云：

浮杯万里过沧溟，遍礼名山适性灵。
深夜降龙潭水黑，新秋放鹤野田青。
身无彼我那怀土，心会真如不读经。
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⑤

刘禹锡的诗意味着智藏入唐不是为了学习佛法获得经书知识。“遍礼名山”与智藏的“性灵”相符，他的精神力到达“深夜降龙潭水黑，新秋放鹤野田青”，“心会真如不读经”是认为智藏是位大人物，他即使不朗诵经书也能通过直觉领悟到“真”，所以没必要向大唐探索基本的新经书和新知识。刘禹锡在结句中反问中国学生中有几人像智藏那样雄猛，以此盛赞友人智藏。

刘禹锡的送别诗的言外之意，是说智藏有敏锐的直觉，因此没必要作为遣唐使入唐留学；虽然他没明说遣唐使派遣的目的是获得佛法、经书、大唐文明的广泛的知识，而在作给皮日休的诗中反用一般的修辞，成功地赞美了友人智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人给遣唐使献上的汉诗对比，日本人给遣唐使献

① 《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40页。

② 《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38页。

③ 《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57页；《历代中日友谊诗选》，42页。

④ 《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36页。

⑤ 《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65页；《历代中日友谊诗选》，30页；《全唐诗》359卷。

① 《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83~85页；《历代中日友谊诗选》，53~55页；《全唐诗》614卷。

上的和歌丝毫不触及遣唐使派遣的背景和目的。主要是祈祷遣唐使的安全往返仪式的意识较强,和汉诗的“赠答”作用相比,可以说是具有“护身符”作用的文学。最令人感动的例子要数山上忆良的长歌。733年多治比广成大使入唐,山上忆良献上长歌《好去好来歌》。如题所述,除了从日本出发和回国外基本不涉及。仿佛不象忆良歌的特有歌调,但终究是以庄严的调子宣扬了“大和国”是永远的神奇语言之国,长歌从此宣言开始。

自从神代始,不断留传说。

神皇治大和,语言焕灵德。

不唯永颂扬,众目亦明澈。

极其威严庄重的14句诗(原诗此为14行,下同——编者),从神的世界到现在的“众目”所见,细说了全人类由大和国的神皇和言灵支配着。从如此赞美天皇的长歌首句开始,话题逐渐转到遣唐使的派遣上来。

济济众良材,入朝任拔擢。

一统山河定,神皇垂恩泽。

曾为贵家子,奉旨入唐国。

以上15句赞美“垂恩泽”的天皇治世,身为“贵家子”的多治比广成从“济济众良材”中,被“拔擢”为大使而“奉旨入唐国”。下面17句列举了广成到“远境”旅行途中以自我守护形式保护他的各种“大御神”和“大国灵”之神。第47句(大概超过长歌的四分之三处)长歌发生了印象上的转变。

〔唐朝〕事毕归来时,保佑甚于初。

诸神临瀚海,双臂护舳舻。

犹如绳墨引,导航俱通途。

近经智可岬,不须曲航路。

直线应速达,大伴三津渡。

早日平安归,欣然将命复。^①

① 小岛宪之、木下正俊、东野治之校注《万叶集》卷五(新编日本古典文学全集6),[日]小学馆,1994~1996年,第894首。汉译据李芒译《万叶集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编者

这首长歌是与遣唐使关联的诗歌中最长的例子,但仍未触及遣唐使在唐的体验和派遣背景等,一个“事毕(归来)”的词语后面,是日本朝廷付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产及人命代价。然而,至于其使命之“事”究竟为何,作者却沉默着一言未发,这点是极有启发性的。出发时祈求神的保护,回国途中依然托付神灵呵护,遣唐船“犹如绳墨”引导般直线航行,经过“智可岬”(值嘉岛),平安抵达“大伴三津渡”(难波)。

长歌的前半部分一半是称赞“大和国”,另一半是有关尊称为神的天皇选拔遣唐使之事;后半部分一半是祈祷安全渡海,剩下一半是对应的结构,想象“事毕”后安全回国,可以说基本上是仪式性的排列。

大宝二年(702),也就是山上忆良向多治比广成大使献上这首长歌的30多年前,他自己曾作为遣唐录事入唐,所以必然十分清楚遣唐使派遣的背景,对当时大唐的生活有亲身体验。但忆良给遣唐大使多治比广成献长歌时选择了最具礼节性的高调,以句“事毕”省略了在唐的具体事务,与遣唐使关联歌的作用与其说是承认遣唐使派遣的现实目的,不如说是表达就像“护身符”一样的和歌具有的仅通用于日本的作用。

四、汉诗的两面性与和歌的一面性

由遣唐使派遣所刺激的文化交流,在异文体中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日本人在使用东亚共同语言的汉诗文时极其自然,他们通过汉诗文体来表达自身文化的两面性。遣唐使在中国作的汉诗,一般是同中国主人间“诗的对话”部分,因此只能在对方的文学教养的习惯下进行交流。最巧妙的诗正如上述日本诗人辨正和仲麻吕作的,根据语言文化的两面性展示了表达高度语言意识的游戏性。试着与汉诗的文体对照,与遣唐使相关和歌严谨地保持其一面性而又集中在日本的地名、现象、精灵的存在、仪式,仅限于以上空间。最特别的是山上忆良的长歌所描述的,遣唐使的文化交流的作用从大业缩小到“事”,创造出与遣唐使关联和歌和汉诗迥异的空间。

各式文体在诗歌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不同的作用,我对此现象兴趣浓厚,今后还想更深入地对此进行研究与考察。

译者:吴赛华(浙江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